

21.17

17
石棉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8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石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石棉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二 辑

21113/2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石棉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目 录

向安顺场的英雄船工致敬……………肖 华 (1)

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回忆……………邓 飞 (8)

原越西县第五区工作回忆片断……………卢鼎衡 (16)

洗马姑匪乱前后……………黄守忠 (21)

石棉县建县初期街房修盖情况……………张宗品 (24)

清代四川松林地土司……………张弗尘 (26)

民国时期松林铜矿建厂始末……………李春阳 (45)

“河道”袍哥史话……………舍 予 (48)

安顺小学的演变……………王伯祥 (51)

石棉县少数民族工作卫生的发展……………肖 骏 (55)

石棉县彝族“送葬词”……………安占云 (64)

忆许寿真烈士和国民党军十二师政治队

……………吴鲁仲 (68)

“美罗事件”牺牲烈士张开泰传略……………黄景星 (115)

我所知道的刘万抚……………周公辅 (117)

刘万抚事迹点滴……………龙泽生 (122)

赖执中的两件事……………孙汝坚 (125)

读者来函照登……………刘郁文 (128)

向安顺场的英雄船工致敬

——为纪念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落成而作

肖 华

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是石棉县安顺场隆重举行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落成揭幕典礼的日子。纪念碑气势宏伟，造型别致，正中镶嵌着红军战士的巨型头像，雕像凝眉远视，威严肃穆，正对着滚滚滔滔的大渡河，雕像下方，是激浪奔涌、飞舟猛进的浮雕。望着文化馆的同志带来的纪念碑的彩色照片，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四十八年前大渡河边的惊心动魄的战斗情景……。

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四渡赤水，重占遵义，南渡乌江，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五月下旬，向大渡河畔挺进。大渡河古称沫水，源于川西海拔五千米的大雪山，全长九百多公里，是岷江的最大支流，河两岸的峡谷危崖陡峭，河水从万山丛中奔泻而下，它是比金沙江更为险要的一道天险。这时，我们红军的处境是十分险恶的：后有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数十万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在前面大渡河沿线，蒋介石又电令四川军阀二刘一杨（刘湘、刘文辉、杨森）调遣精干部队扼守各主要渡口：上游泸定桥驻有三个“骨干团”，下游富林镇驻敌21军王泽浚一个旅，安顺场下游的小水渡口驻敌余伟如一个团，敌人重兵严峙，凭险而踞。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翼王石达开率众十万余人，转战数省，于1863年5月抵达紫大地（安顺场），因无法逾越大渡

河，被围困一月之久，终于全军覆没。蒋介石飞临成都，亲自督战，梦魇石达开悲剧在红军身上重演，竟从飞机上撒下了“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反动传单，沾沾自喜，得意忘形。面临这种局势，我军如不能迅速抢占大渡河，则将被迫转入川康交界的雪山荒原，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红军从西昌出来后，有两条路可通大渡河，一条翻小相岭，从越嵩到汉源的大树堡，渡河攻打富林，威逼成都。另一条经冕宁，过大凉山，从安顺场过河，这是一条蜿蜒崎岖的山间小道。我军声东击西，以一部占领小相岭，直达大树堡佯渡，钳制富林方向的敌人主力，以红一师一团和工兵连为先遣队，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率领，疾速向安顺场渡口挺进。当时，我担任一军团组织部长，率领工作团奉命随先遣部队进行政治工作和沿途的群众工作。

五月二十四日，下着毛毛小雨，我们从擦罗出发，经过小堡子、老街子，海洋会，踏着又湿又滑的山路，于深夜十点赶到了马鞍山，马鞍山距安顺场尚有十多里，茫茫雨幕中，吓人的水声如虎啸牛吼，如雷滚峡谷，这就是横在我们前面的大渡河了。天气热了，上游雪山里的冰川融化了，单听这声音，便可以想见涨水的大渡河是何等凶猛，何等狂暴。在山顶，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黎林同志和我一起研究，决定一团二营赶到下游小水渡口佯攻，牵制余伟如团的主力，以孙继先的第一营冒雨奔袭，乘敌不备，迅速打垮了敌人驻防在安顺场的两个连的兵力，并在靠河的水东门弄到了仅有的一只渡船。

这是一条不寻常的船啊！

红军到来的前几天，安顺场的守敌惶惶不安，急忙撤走了全部渡船，并强令老百姓迁往对岸的安顺坝，同时，他

们在安顺场街道上堆满了干柴干草，准备放火燃毁安顺场，一心要置红军于死地。眼看要放火了，恰巧安顺场的大地主赖执中前往西昌阻击红军败退下来，安顺场的房屋有一大半是赖执中的产业，一旦放火，赖家就要损失万贯家财，为此，赖执中和负责飞街的头目争吵起来，双方扭过河去，闹到余团长那里，赖执中“具结”担保在红军到来之前一定烧街。交涉完毕，赖执中当即返回安顺场，但他做梦也没有料到，神兵天降，红军当天晚上就袭击了安顺场，夺得了这条靠在南岸的唯一渡船。这条船，关系到三万红军的安危存亡，关系着红军北上方针能否顺利实现。毛主席和总部首长就在我后面，他们热切地盼望着我们强渡成功，很快突破天险。可是，在这样的季节，安顺场河床宽达三百多米，两岸悬崖峥嵘险峻，满河雪浪滚滚，如万千匹野马脱缰而下，象雪山飞下的巨龙要冲出山壑，河道落差很大，水的流速每秒钟四米，水疾浪猛，漩涡如转轮，再高强的水手，一下去就会被狂流卷走，吞没，就是行船，也非得当地那经验丰富，谙知水情的船工才行。

寻访船工成了渡河的当务之急。

我和一团派出的同志踏着泥泞，披着从云隙间时隐时现的月光，连夜深入周围的山沟，走家串户，终于找来了十多位船工。我们请船工一起吃饭，一起吃酒，座在一块拉家常，当了解到船工的痛苦生活和刘家军阀对船工的残酷剥削时，我说：整个国民党蒋介石都是保护土豪劣绅、保护大地主利益的，刘家军阀就是四川地主阶级的靠山。我们这次来，就是专门消灭刘家军，解救咱穷苦老百姓的。然而，说起渡河，船工们顾虑又很多，要排除他们心上的疑虑，还要靠我们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眼下是涨水期，

如果仅仅是水疾浪高，凭仗多年的撑船经验，虽担些风险，尚可以对付，可是，现在面临的是对岸山崖上有24军韩怀阶一个营的兵力在把守，渡口上耸立着四座专门封锁渡口的碉堡，那么多枪弹居高临下，集中目标对这一条木船开火，只要有一两颗子弹击中艄工或者船身，必然是船毁人亡。我告诉船工们：我们红军具有比敌优势的火力，完全可以压制敌人，摧毁对岸的碉堡和工事。我们红军一路上闯关夺隘，以破竹之势突破了乌江、金沙江等许多天险，连续打垮了很多阻拦的敌人，眼下要消灭对岸的那伙“双枪兵”，我们是有把握的。你们为红军划渡，帮助我们一起打过河去，就为普天下的穷人立下了莫大的功劳……

那时候，我们这些人个个都穿着单裤，足蹬草鞋，没有袜子，因为转战数省，打过许多仗，经历许多坎坷，一个个显得又黑又瘦，然而精神充沛，神彩奕奕，人人仿佛是钢铁浇铸的汉子。十多位船工在熹微晨光里凝视着我们，深深为我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深邃的眸子里闪烁着信任和敬佩的光芒。

经过动员之后，船工们一个个情绪高昂，他们拉着我的手走到河边，指着浪涛漩涡兴奋地告诉我，他们在安顺场有的已经撑船二、三十年了，哪里水深，哪儿浪猛，他们都了若指掌。他们告诉我，大渡河暗礁很多，特别是边上靠近悬崖，形成了许多暗流漩涡，大渡河行船就跟你们打仗一个样，要有胆量，有魄力，还要有经验，熟悉水情……有的船工还摇着我的手，提出过河之后要参加红军，跟我们的队伍一块走。有的表示，与其被刘家军活活逼死，还不如投身革命，为红军尽力，这一次纵然是牺牲在大渡河里，也是值得的……船工们那饱经风霜的面容，那一双双

挥动着的长年摇橹使篙的大手，那回响在强大风浪里的粗犷豪爽的声音，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二十五日清晨，天空放晴，白云浮动，以熊尚林为首的十七勇士和挑选的八位船工上船之前，由我做了一番简短的动员讲话。我说：“同志们，这次渡河是我们北上抗日的一个大关口！毛主席和全体红军指战员在注视着我们的这次行动。我们要发扬强渡乌江、强渡金沙江的勇敢精神，团结一致，同舟共济，奋勇向前，只有渡过河去把敌人打垮，夺取渡口，才能完成北上抗日的任务。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同志们一定要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勇士们和船工们勇敢地登上了船，杨得志团长下达了进攻的号令，木船在惊涛骇浪中颠簸前进了。对岸的敌人胆战心惊，慌慌张张向渡船射击，船四周打起了一大片浪花和水柱。刘伯承、聂荣臻同志站在河边的工事里，用望远镜望着对岸，亲自指挥，我们的迫击炮连神炮手赵章成营长的操纵下，以仅有的四发炮弹，炮炮命中，摧毁了敌人的火力点和河边的两座碉堡，我们一团的机枪、步枪在杨得志同志指挥下，猛烈地向敌开火，子弹象狂风暴雨似地卷向对岸，打得敌人抬不起头。炮火连天，惊涛骇浪中，八位船工和十七位勇士一样，在极度的紧张中显得沉着、勇敢……孤舟颠颠簸簸地接近了对岸，按预先计划，船只本打算靠在对岸尖石包前，但因流水太急，敌火又猛，船被冲到下首几十米处的桃子湾，一下子撞在大礁石上，船旁激起一串串白浪，再往下滑，荡进漩涡，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只见几个船工猫下腰来，迅速用双手撑住岩石，尽最大力气稳住摆荡的船只，岸上的人们见此情景，一齐呼喊起来，为勇士们鼓劲，助威，这时候，由船上跳

下了四个船工，站在滚滚的水浪里，拼命用脊背扛住船帮，另外四个船工握竹竿使劲猛撑，让船向渡口靠拢……对岸碉堡里的敌人，竟呐喊着从碉堡里反扑出来了。短兵相接，正是关键时刻，我们的小司号员气不足，号音突然中断了，我十分着急，一把抢过号来，鼓足力气吹响了冲锋号，嘹亮的号声越过了峡谷，更加激励起战士们冲锋陷阵的精神，十七勇士跳下船去，在一片硝烟炮火中挥动大刀，象雄狮一样，怒吼着杀向敌群，经过鏖战，韩怀阶一个营的“双枪兵”溃不成军，我军占领了渡口工事，取得了突破天险大渡河的伟大胜利。

控制渡口之后，为了抓紧时间抢渡，我们曾试图架设浮桥。后续部队为我们准备了许多铁丝、木板、竹子。架桥指挥是何迪宙，他原来是敌人工兵营营长，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我军俘虏过来的，由我任架桥政委。我们将几十根铁丝拧结为一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浮桥刚搭好一半，就被湍急的洪流冲垮了。反复数次，皆因水急浪猛，流速太快而未能成功。

为了抢时间，我们发动群众，把沉在对岸安顺坝河边的一只船弄了起来，又找来一批木匠，抢修好了一只坏船，撑船的水手也陆续增加到八十多个，成立了一个指挥部，由船工刘学仲负责总指挥。所有的船工分为四班，人歇船不停，日夜抢渡。夜里，大渡河两岸燃起了马灯，点亮了篝火，照耀得两岸渡口满天彤红……一连七天七夜，船工们顶风冒寒，不顾疲劳，不顾危险，总共渡过了四个团的兵力。

正在第一天渡河的时候，一军团的主力赶到了河边，紧接着，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总部首长也来了。他们

见水流太急，架桥已不可能，而红军在岸边又越聚越多，单凭这三条小船渡河不知要花多少时日，眼见敌情越来越紧张，毛主席和一军团首长当即决定，尚未渡河的部队为左路军，由政委杨成武、团长王开湘率领红四团为先头部队，以雷霆万钧之势，以风驰电掣之速，去夺取泸定桥；我们已渡河的部队组成右路纵队，刘伯承同志任司令，聂荣臻同志任政委，罗瑞卿同志为参谋长，我为政治主任，溯河北上，配合左路主力抢夺泸定桥。

红军强渡天险大渡河之所以取得成功，蒋介石的阴谋诡计之所以会彻底破产，除了毛主席战略指导方针的英明正确和红军战士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奋斗精神之外，与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是密不可分的。没有枪林弹雨、险风恶浪中与红军战士生死同舟的船工们，没有船工们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红军要飞越天险简直是难以思议的。如果说，红军是飞渡天险的大鹏，那么，在浪涛里驾船的船工就是雄鹰的翅膀。第一条船上的十七位勇士的英名可以长留于革命史册，同舟的船工的英名也必然闪耀着同样的光芒。

天险，顽敌，阻挡不了具有钢铁意志的军队和人民。最近，安顺场竖起了纪念红军强渡大渡河的纪念碑。文化馆的同志告诉我，这纪念碑是当地产的花岗岩雕砌的。花岗岩是最坚硬、最刚强的石材，它永远象征着红军战士和船工们坚毅果断、所向无敌的钢铁意志，也永远显示着红军队伍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与劳动人民所结下的坚如磐石的血肉情谊。

流水长存，青山不老，这尊纪念碑将永久铸立在大渡河畔，也铸立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

一九八三年五月

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回忆

邓 飞

编者按：

邓飞系商业部离休老干部，江西省兴国县人、原名邓富连，1935年长征时期任红一方面军二师六团政委。这篇回忆录是邓飞同志今年八月九日一十八日到石棉、泸定以及马尔康等坝州的有关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后，回北京写出《中央红军长征战斗在四川的回忆》初稿，我们编选其中的“向大渡河下坝挺进”一段，另改标题，独立成篇为《强渡大渡河战斗的回忆》以续读者。

五月十六日，我红一军团作为前卫部队，从会理出发，取道德昌、西昌、冕宁，向大渡河的安顺场前进。前卫一团十七日攻占德昌之后，部队继续前进。到达西昌时，西昌城内的国民党驻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的部队固守不出。我军没有攻城，而是绕道西昌城外，进入冕宁境内，并于二十一日占领冕宁县城。

冕宁是少数民族彝族所在地区。长期以来，那里的人民饱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严重的民族歧视、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二十二日，我军进至大凉山。那里彝族部落很多，与我们的风俗习惯很不一样，语言也不通。由于他们不了解红军，因此，作为红一军团前卫连的工兵连受到了

阻击而未能通过。后来，刘伯承司令员与彝族咕基家的首领小叶丹一起斩雄鸡喝血酒，结为“金兰之盟”。最后，他们终于同意我们从这里通过了。

当时，为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以使彝族人民能够对红军有所了解，我们的部队不进民房，不扰村民，克服了诸多困难，在道路两旁的树林里露营。有一天晚上，下着大雨，我们在森林中根本无法睡觉，而是座在冰冷的石头上，背靠背地休息。寒风瑟瑟，冷而凄凄，同志们哪能睡得着哇，只能半睡半醒地座着，用手挠着头皮，将就着熬过了漫长的夜晚。

部队路过彝区的时候，我看到在路两边的山坡上有许多彝族居民村，在道路的两侧，站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人们。他们带着惊异的神情，微笑地看着我们前进的队伍。有个高个子男人，对着我哇啦哇啦地说了一些什么。我听不懂他的话，但知道他的意思是向我要钱。因为有所准备，于是我就给了他一块小银元（伍角）。他接到钱后非常高兴，并欣喜地向他的同胞诉说着、夸耀着。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从而消除了彝族群众的误解，顺利地通过了冕宁彝族居住区。

三十年后，即一九六五年六月中旬，我从成都乘汽车去渡口市，经过冕宁县政府时，有一位彝族副县长（姓名忘记了）招待我吃午饭。我问他：

“我们红军长征路过这里时，有很多树林，林子里有许多高大的树木：现在怎么都看不到了？怎么只剩下一些不高的小树了呢？”他说：“那些大树在抗战时期都被砍光了，现在这些小树都是解放后才栽的。”

我又问：“你今年多大岁数？”

他说：“四十岁。红军长征路过这里时才十岁。那时我已经懂得一些事情了，知道红军纪律很严格，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是为工农群众谋利益的；知道红军对彝族人民平等相待，与国民党大不一样。”

我说：“红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少数民族一律平等，共产党有着正确的民族政策。”

他连连点头，说道：“自从红军长征路过这里之后，彝族群众对共产党对红军有了一定的认识，受到了不小的教育。”

我军通过大凉山彝区之后，向安顺场方向急进。前卫一团担任着夺取安顺场的任务，他们经过今石棉县（原名光明场，又名农场）的新场、马鞍山，于五月二十四日晚上抵达安顺场。我们六团在一团之后跟进，于二十五日早晨进驻安顺场右翼的下坝、小水。四团在我六团之后跟进，也是在二十五日这一天，到达了安顺场左翼的老街。

当时，敌军为了阻击红军北上，在大渡河北岸的布防形势是：敌刘文辉二十四军所属的五旅第七团驻在苏家坪，安顺场渡口北岸的安靖坝有一个营的兵力，距苏家坪八里。上游挖角坝有一个团，下游的乐山、峨边等地还有六个混成旅。此外，国民党中央军薛岳追击兵团之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则追击红军进到西昌、泸沽一带，距大渡河只有几天的路程，眼看就有形成一个前后夹攻的包围圈的危险。

为了尽快甩掉敌人，实现我军的战略意图，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抓紧进行渡河的准备。五月二十五日，他们在安顺场找到一只船，在安靖坝搞到一只破船找木工修复，二十六日我一团一营在小水又找到一只船。这样，他

们就利用仅有的这三只船，在当地船工的大力帮助下，打响了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我部队集中火力掩护渡河，军团炮兵营长、神炮手赵章成连发了三颗迫击炮弹。我们站在河岸的沙滩上，看着炮弹不偏不斜正好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溃不成军，拚命逃窜。

就在同时，我听说一军团参谋长左权和二师政委刘亚楼率领五团以及军团侦察科长刘忠率领的侦察连占领了大树堡渡口，大造在大树堡渡河的声势，并且各料造船迷惑敌人。蒋介石、刘湘急忙向那里调集部队，从而忽略了在安顺场、泸定桥等其他渡口加强防备。当我佯动部队得悉红一团已于二十五日在安顺场开始强渡之后，即火速返回安顺场并归还了建制。

当时，我们六团正在安顺场下游的下坝、小水。下坝位于大渡河一个大沙滩的边沿，有几十户人家，仅有一条小街，路面全是石头铺成的。附近的山脚下还有着零散的住户。小水又在下坝的下游，距下坝约四里路，有十多户人家，当时我们六团一营正驻在那里。上级给我们团的任务：一是要接替红一·团二营，担任向农场方向的警戒（安顺场距农场二十四里）；二是用重机枪等火力扫射对岸安顺场之敌以及被击溃之敌，掩护红一团强渡；三是接受一军团首长临时下达的任务。

我们团部指挥所设在下坝的沙滩上，用电话与上级联络。二十六日中午，当时的军团长林彪打来电话，要我们询问已经渡过河去的一团二营正在什么位置以及对岸的情况。可是这一带河面宽达二百多米，水深十二米多，流急浪大，波涛澎湃，用吹号的方法与对岸联系根本听不到。我们只能用望远镜看对岸，只见一团政委黎林同志

正在河对面的小路上走着。我把这个情况向军团首长做了报告。首长用电话问：

“你看到黎林没有？”

我答：“我看到他了。”

首长问：“你问他们部队已到什么地方？”

我答：“我们现正在吹号联系，他们听不见。”

首长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标语摆在沙滩上问他。”

我说：“这个办法好。”

于是，我与朱水秋团长商定，让宣传队的同志写好了大字标语摆在沙滩上，并发了信号弹，与对岸的黎林同志联系。黎林听到信号弹后，用望远镜看到了我们的问话标语，于是当即用大字标语回答说：

“二营前三连进至苏家坪，该敌已向汉源方向逃窜。”

我即刻将黎政委的回答用电话向军团首长做了汇报。

我们到达大渡河的时候，有的老年人对我们说：“七十多年前，石达开在这里打了败仗，全军都复没了。你们可要千万注意哟”

我回答说：“我们与石达开不同。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为工农群众服务的队伍。我们有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一定能够渡过大渡河。”

一八六三年五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兵两万西进，在这里苦战一个多月，终于陷入绝境，以至于全军复灭。石达开本人也惨遭清政府的杀害。七十二年后的一九三五年，同样是五月间，同样是河流洪水爆发的时节，中央红军也来到了安顺场。当时蒋介石狂妄地叫嚣：“大渡河乃太平天国石达开复灭之地，现在共军入此彝汉杂处，……必步石达开的复辙。”他叫嚣“要让共产党做石达开

第二，”他令其部队“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鲁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然而，我中央红军却在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妄想。我先遣部队红一团已经在强渡大渡河，我后续部队也同样要胜利地渡过大渡河。这正如陆定一同志所写的那样：“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但是，由于安顺场南北两岸悬崖陡峭，地势险峻，而且河流水急浪高，河面宽达二百多米，再者又仅有三只小船，每往返一次就需要一个小时，因此，如果整个野战军部队都从这里过河，前后就得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显然，这是当时的敌情所根本不能允许的。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我和朱水秋团长站在下坝的沙滩上，望着往返于大渡河两岸正在进行紧张强渡的三只小船，又喜又忧。喜的是我红一团已经突破了面前的这座天然屏障，正在抓紧时间渡河。忧的是眼下船只太少，如果渡江时间拖得太长，弄不好就有被分割于大渡河两岸，遭到敌人各个歼灭的危险。正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电话员谢金福说：

“二零一（二师师长陈光代号）要二零九（六团团长代号）讲话。”

朱团长接过电话，认真地听着陈师长说：

“根据当前的敌情，我野战军要全部在这里渡河是不可能的，时间拖得太长将对我军不利。因此，中央军委决定：除一师三个团和干部团在安顺场渡河外，我野战军主力部队沿大渡河西岸上行抢夺泸定桥。现在以四团为前卫，担负夺桥任务，于二十六日下午出发，于二十九日夺取泸定桥。你团在四团后跟进，于二十七日拂晓前出发。师直和五团随你团后跟进……”

我当时就站在朱团长的旁边。他放下电话筒，对我说：“四零零（我的代号），你听到了吗？”

我说：“听到了。”

于是，我俩让通讯员立即把团参谋长刘瑞龙和团的党总支书记张国华找来，把师长的命令及时地转告给了他们。随后，我们通知各营连尽快做好出发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据了解，从安顺场到泸定桥有三百四十里行程，道路崎岖，要翻好几座山，途中还有着盘踞的敌人。但当时我军对泸定桥的敌情还不太了解，只知道川康之敌刘文辉的二十四军正向泸定桥方向调遣兵力，企图固守该桥。

五月二十七日凌晨，我六团全体指战员沿着四团走过的道路向泸定桥方向挺进。当时天空乌云密布，冷雨潇潇，河水浪花喧腾，哗哗作响。我全团指战员在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上冒雨行进。我们走了三天，先后经过了安顺场、菩萨岗、猛虎岗、磨西、德威、杵泥、田坝、沙坝等地，一直向泸定桥方向前进。第三天一天就走了一百八十里的路程。

二十九日下午，红四团夺得了泸定桥。当天晚上，我六团供给处主任胡弼亮也率领各营连的设营人员过了桥，并做好了部队吃饭和休息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十日凌晨，天刚蒙蒙亮，我团便开始过桥了。泸定桥长一百零一米，宽两米多，整座桥用十三根铁索联结于大渡河的东西两岸，其中九根铁索作桥面，左右各有两根作扶手。桥面离水面几十米高，桥下激流翻滚，恶浪滔滔。人走到桥上桥身摆动，令人毛骨悚然，心惊胆颤。我们过桥时，桥面上铺的板子各式各样：有敌人未烧尽的桥板，